

我国经济次发达地区的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

○ 王可侠¹, 杨学峰²

- (1. 安徽省社科院 经济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51;
2.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从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依据不同时期的城镇化水平,可以将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我国目前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各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不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同。针对经济次发达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特定关系,本文着重从承接产业转移的角度,探讨地区如何从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阶段,顺利转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阶段,加快实现地区新型城镇化目标。

〔关键词〕经济次发达地区;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皖江示范区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现代文明历史的两个重要驱动轮。二者互为基础和条件,互相带动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类历史进步。从传统的一般意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走向现代工业化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内容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特征。目前,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实现新型城镇化路途还比较遥远。但是在这些地方也有一部分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其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仅次于沿海地区,形成我国经济次发达地区。如中部的两湖、西部的重庆等;甚至在一个省内也有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如安徽的皖江

作者简介:王可侠,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杨学峰,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本文系 201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培育)项目“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报告”(11JBG012)的部分成果。

示范区。这些次发达地区在带动经济落后地区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上,具有更好的承上启下和示范作用。

依据不同发展阶段上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的变化,本文从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探索我国尤其是经济次发达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

一、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与发展路径

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看,现已成熟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早期的城镇化水平,在发展上没有明显的界限划分,其发展过程完全来自市场化过程的自然演绎。我国目前所倡导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则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是相对过去我国的传统城镇化而言的,并将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路径实施。但是无论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不能继续在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下完成,而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作用,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使促进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各种关系增强互动,协调发展。

(一) 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

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对新型城镇化的定义主要集中在国内理论界。高国力把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特性概括为几个协调:一是依托城镇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协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二是引导工业加快转型升级,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三是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加强中小城市建设,协调大、中、小城市关系。^[1]陈怀录等认为,新型城镇化要与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发展,是区域城乡统筹和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也是产业结构合理、规模化生产的城镇化,最终实现人本、市场、文明、特色、绿色、城乡统筹、集群和智慧城镇化。^[2]在强调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区别上,人们主要从质与量的改变上对新型城镇化进行定义。如吴定平提出,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3]王如松则对新型城镇化的“新”与“型”进行解读,认为“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型”指转型,包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转型。^[4]

概括上述理论,所谓新型城镇化,一是实现城市规模由量到质的全面提升,使城市由硬件建设概念转变为软件服务的概念;二是统筹社会经济的主要方面,使各种关系能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人人能无差别地享受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便捷和高水准生活。

其实,我们所要实现的新型城镇化,与西方国家高度城市化后所呈现的内容并无太大差别。首先,在发展理念上,人是第一位的,即城镇化的每项事业都是围绕人的需要展开,因此它的成果也是人们能切身感受到的。其次,在发展格局上,城乡之间既没有地缘上的边界概念,也没有硬件和软件等服务设施上的差

别。大城市除了拥有较多公共机构,更多只是作为交通枢纽集散人流和物流;小城镇则在服务社区上发挥更多的职能和作用。再次,在发展水平上,那些为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传统工农业,已远远退居次要地位;为满足人们物质享受的现代服务业则获得较快发展,在三次产业指标上占有绝对比重。

(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

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新型城镇化,国内的理论研究主要寄希望于政府采取更好更有效的政策措施,这与我国目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是分不开的。而国外的研究则更多从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性内容展开。美国地理学家 Northam 通过对各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提出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呈现一条被拉平的倒 S 型曲线。初始阶段的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超过 10% 以后,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但仍处在传统农业社会状态。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30% 时,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加快推动了农村人口开始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出现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郊区城市化随之兴起。当城市人口超过 70% 以后城市化进程呈现停滞或略有下降趋势,此时经济发展以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导,城乡差别越来越小,区域空间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5]而 Friedman 提出的核心——边缘理论,则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空间经济整体出发,认为城市或城市集聚区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本、技术等资源聚集的核心区,经济较为落后的小城镇和乡村为边缘区。这种二元空间结构的区域差异先是随资源不断从边缘区向中心区转移而扩大;只有当工业化趋于成熟时,资源才会向边缘区扩散,使边缘区得以发展。因此他主张通过政府干预,逐渐使边缘区域成为新的有吸引力的工业区位,缩小区域差异,最终打破核心和边缘的界线,形成完全一体化的空间经济。^[6]关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研究,英国学者 L·范登堡在《欧洲城市兴衰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城市发展阶段说”,他认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的变化,决定了城市顺序发展的各个阶段。经济结构变化的三阶段依次是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由工业经济过渡到第三产业经济;第三产业部门继续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与此相适应,城市化进程也划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阶段;市郊化阶段;反城市化与内城的分散阶段。^[7]其后,美国学者 Ginsburg 等依据工业化进程把城市化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即向心期、绝对向心期、相对向心期、相对离心期、绝对离心期和序列一规则分布期。^[8]

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从传统城镇化走向新型城镇化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内容。第一阶段,城镇化水平在 30% 以下,是城镇化缓慢发展阶段。1996 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 30.48%,标志着此时的中国已经跨越这一发展阶段。第二阶段,城镇化水平达到 30% - 70%,是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至 2012 年末我国总人口 13540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71182 万人,城镇化水平达 52.57%。^[9]虽然我国总体水平已经达

到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期,但是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普遍达到60%以上,其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已经由粗放模式转向集约化发展;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一般在40% - 50%之间。在这些地区,无论工业化还是城镇化,扩大规模依然是二者水平提升的主要路径。第三阶段,当城镇化水平超过70%以后,将有可能实现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水平也将进入平稳发展的阶段。如美国在城镇化水平快速成长阶段,城镇化率年平均增长0.52个百分点;而从1970 - 1980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的年平均增长只有0.01个百分点,城市化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0]

从上述三个阶段城镇化发展内容看,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努力主要在第二阶段。在此阶段,经济能否成功转型,产业水平能否适时提升,将决定我国在城镇化率达到较高水平时,是为城镇化的病痛所折磨,还是为城镇化的成果所享受。

二、经济次发达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

实现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过程,没有新型工业化就没有新型城镇化。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发展还处在工业带动阶段,只有加快工业化才能加快城镇化发展;而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基础的限制,加快工业发展需要大力承接产业转移。能否更多地承接产业转移,以及承接什么水平的产业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能否真正实现新型城镇化,及其实现的速度。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呈相互带动作用,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二者的作用和地位有所不同。

1. 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水平通常在35% - 60%。一方面,一定水平的城市规模和基础设施为传统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经济动力,而这个动力就来自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扩张,以及财富积累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从我国1997 - 2012年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的走势看(见表1),1997年,工业化水平高于城镇化水平近20个百分点,其后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但是工业化始终保持高于城镇化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差距,表明了工业化优先发展,并带动城镇化发展的事实。

表1 1997 - 2012 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工业化	50.1	50.2	49.9	50	50	50	50.9	53.1
城镇化	31.91	33.35	34.78	36.22	37.66	39.09	40.53	41.76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工业化	55.2	57.4	59.2	60.4	61.9	63.3	65.2	66.4
城镇化	42.99	44.34	45.89	46.99	48.34	49.95	51.27	52.5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3

工业优先发展使二产比重迅速上升,一产比重相应下降。美国从 1870 - 1910 年,一产由 51.5% 下降到 33.4%,二产由 24.7% 提升为 35.2%。大批农民进城转身为产业工人,也带来收入水平总体上的提高。霍里斯·钱纳里用 1950 - 1970 年间 100 个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增长速度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关系,说明当人均收入大于 100 美元后,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第二产业的比重提高更快,因此前者与后者的比值呈不断下降的走势。^[11]这也说明,在一定的人均收入区间里,城市化水平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我们以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四省 2012 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板,演算结果(见表 2 中 C/B 一栏)显示,目前我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阶段。通过四省数据比对,地区之间的差别也清晰可见,说明中部和东部处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安徽乃至皖江示范区,不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其发展的主旋律依然是粗放型的规模扩张。

表 2 2012 年江浙皖赣四省的人均收入、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人均收入(\$)	2975	4326	2165	2155
A(%)	50.2	50.0	54.6	53.6
B(%)	42.7	51.0	26.3	31.0
C(%)	63.0	63.2	46.5	47.5
C/B	1.48	1.24	1.77	1.53

注:人均收入(\$)按照 2012 年 12 月 31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对人民币 6.2855 元折算;A 为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份额;B 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C 为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2. 工业化与城镇化互为带动,协调发展的阶段

通常当城镇化水平在 60% - 70% 时,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进入互为带动阶段。这一期间,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最大特征,就是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工业的集约型发展带动城市服务功能完善;城市的集约型发展带动工业的转型升级。这种协调发展的关系促使二者自身水平不断升级。

当然,即使在城镇化率达到较高比值时,如果不能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工业化或城镇化任何一方的粗放发展,都将阻碍另一方走向集约;二者粗放发展的结果使其互为限制,共同落入“发展陷阱”。这个结果已经在上世纪末,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得到验证。

3. 城镇化带动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

通常当城市化水平超过 70%,工业化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减弱,第三产业在城市化中的作用日益突出。Vance 认为,第三产业的特点是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因此不可能像工厂那样进行大规模地郊迁;而且,第三产业的门类众多,手工操作比例仍然很高,只有在城市中才能找到所需大量的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因此第三产业在就业中占的比例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12]

在此期间,工业化发展因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兴起,其增长速度相对缓慢;而城镇化却因空间服务领域的扩大,其规模会继续扩大。如美国在 1950 - 1980 年间,超过 100 万人的大城市人口增加只有 74.5%,而城市面积的增加高达 147.7%,城市人均用地增加了 84.4%。^[13]

(二)承接产业转移对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以皖江示范区为例

承接产业转移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依据不同的发展内容,其影响作用也不同。首先,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阶段,承接产业转移通过壮大产业规模,影响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其次,在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阶段,承接产业转移通过产业集聚带动城市化集约发展和水平提升。Bruhart 和 Mathys 通过对 1980 - 2003 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经济影响通常是积极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于本地化经济的影响,金融服务业除外,大多是负面的,表现出明显的阻碍作用。^[14]再次,在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阶段,承接产业转移通过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影响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功能完善。

1. 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了经济次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

2010 年 1 月,皖江示范区正式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第一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此后,该地区迎来承接产业转移的高潮。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皖江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跟进速度明显加快。

从数字比较看(见表 3),2009 年,皖江示范区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全省水平几乎持平,而比全国水平低 1.08 个百分点;到皖江示范区成立两年后的 2011 年,该区域非农产业比重与全省的差距拉大 3.16 个百分点,而与全国的差距缩小到 0.84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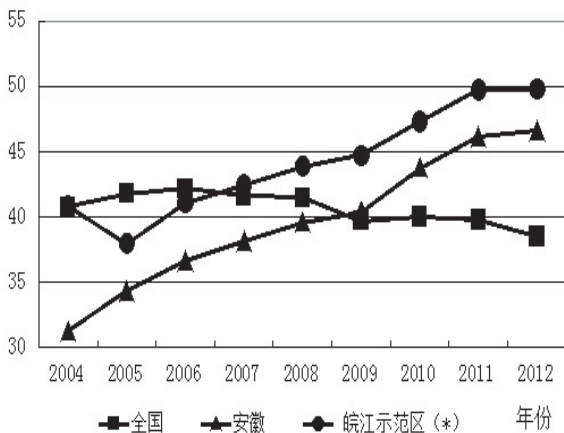
再从工业化水平提升速度看(见图 1),2009 年后,皖江地区工业化率大幅提升,带动全省工业化水平整体走高,并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在工业化水平提升的同时,皖江示范区的城镇化进程也明显快于全省和全国。如表 4 所示,2009 年皖江示范区的城镇化率高出全省 6.8 个百分点,到 2012 年,二者的差距拉大为 7.5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皖江示范区与全国的差距也从高出 0.56% 提高为 1.43%。

表 3 皖江示范区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与全国、全省对比

	2009 年		2011 年	
	就业人员总计 (万人)	非农产业比重 (%)	就业人员总计 (万人)	非农产业比重 (%)
全国	75828	61.90	76420	65.20
全省*	3988	60.73	4120.90	61.20
皖江*	1815.9	60.82	1847.46	64.36
皖江占全省比重 (%)	45.53		44.83	

注:带“*”号指标为不含六安市金安区、舒城县数据
资料来源:2012 年《安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图1 工业化率水平对比折线图



注:工业化率根据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计算。皖江示范区数据不包含六安市的金安区、舒城县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3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4 皖江示范区城镇化率与全国、全省的对比

年份	全国城镇化率 (%)	安徽城镇化率 (%)	皖江示范区城镇化率 (%)		
			常住人口 (万人)	城镇人口 (万人)	城镇化率 (%)
2009	48.34	42.1	2722	1329.897	48.9
2010	49.95	43.2	2713.2	1376.9824	50.8
2011	51.27	44.8	2720.48	1423.8051	52.3
2012	52.57	46.5	2731.9	1476.0022	54.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3年《安徽统计年鉴》

2. 承接产业转移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功能

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是地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经济次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则能开始本地区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以皖江示范区的家电产业为例,2010年以前,合肥、芜湖和滁州三市依靠家电产业转移风潮,形成“三足鼎立”的全国第三大家电生产基地。随着家电产业链不断延伸,该地区的产业基础逐步扎实,城市服务功能也逐步完善。2010年后,伴随着皖江示范区成立形成的动力,新一轮家电产业转移大潮再起。但是,此番由沿海向皖江地区的家电产业转移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中心的转移,而更多是该产业的研发中心和实验中心的转移;同时,与该产业升级相关的新型配套产业也紧随而来。皖江地区的家电产业,不仅从生产基地迅速扩张的粗放型发展,走上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产业水平不断升级的集约型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还崛起了皖江地区一个更新更有前景的优势产业——电子产业。

电子产业在皖江地区的迅速崛起,助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一是因其广泛应用的特点,带动了其它优势产业的水平升级,如装备制造业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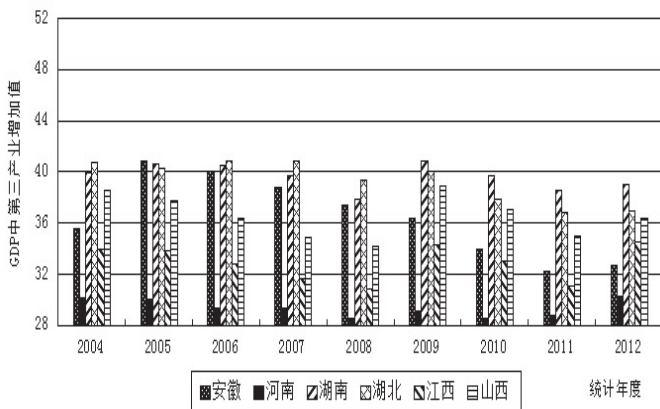
控制领域、汽车产业的电子控制领域等；二是因其产业配套容易下沉小城镇的特点，能辐射带动小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换代；三是因其高技术性和集约化生产的特点，带动了城市化的集约发展和水平提高。

3. 承接产业转移提升了中小城市的现代服务业水平

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发生的几次产业转移大潮，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产业转移的内容和层次也大不相同。而产业承接的内容与层次，也是与承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目前，皖江示范区乃至整个安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严重阻碍了城市服务功能完善和地区产业水平升级。从图2安徽与中部省份的比较中可见，皖江示范区成立后，安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不升反降。这主要是对工业企业转移的大力承接挤占了三产发展的空间。随着产业配套基础和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发展并从生产性企业中分离出来，服务业将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能不失时机地抓住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要求，先从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着手，打下承接服务产业转移的基础；再利用好上海自贸区现代服务业给皖江示范区带来的辐射优势，那么，地区就能在新一轮承接产业转移中，迎来城市化水平更快升级的新机遇。

图2 中部六省 GDP 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柱形图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http://tongji.cnki.net/kns55/index.aspx>

三、发展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系统地指明了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将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各种制度保证。沿着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统筹工农、城乡及社会与经济各种关系协调发展，才能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

(一)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产业是城镇的基础，失去产业支撑的城镇化会带来“城市贫民窟”、“鬼城”

等问题。因此,城镇化发展要防止没有产业支撑的“造城运动”,或强行“迁农进城”。姜瑞斌认为在产业结构上,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应选择走三次产业区域“梯次型”的发展道路。东部地区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做实产业升级“领头雁”地位;部分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则应补走工业化道路,接力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工业“蓄水池”。同时,加强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产业的梯次转移,鼓励能耗低、污染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中、西部合理流动,实现体内良性循环;对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则加强环保约束,限期升级治理。^[15]

当一个地区需要更多依靠产业承接来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必须适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才能保证产业水平不断提升并带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因为,承接地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的产业结构状况,直接影响着产业转移内容和自主创新能力。如果承接地的产业结构形成主要靠低端资源利用时,产业承接内容更多集中在以占有资源和利用资源为目的的产业转移。^[16]这种低端产业基础只能支撑低水平的城镇化。低水平城镇化的发展虽然需要并吸引农民进城,但却不能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农民工只能作为城市的边缘人群存在。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既需要一定的产业基础支撑,更需要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以适应产业水平升级的需要。从目前条件看,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及其偏好影响,是阻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大掣肘。产业结构调整,更多要靠市场引导而不是政府引导。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 打造成熟的制度体系,加快城市集约发展步伐

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的适度规模控制,是政府转变发展观念和行为的重要方面。Henderson 运用 GMM 方法,选取了 80 - 100 个国家 1960 至 1995 年间每五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城市集中度。随着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最优城市集中度会有所下降。如威廉森的城市集中度最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逐步提高,当人均收入为 3000 美元时达到顶峰,之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城市集中度在下降。^[17]进入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阶段的经济次发达地区,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集约化发展和稳定性管理。

所谓集约化发展,首先要防止“求大”意识下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规模越大,管理服务水平越难跟上,“城市病”也越重。其次要防止地方政府借着发展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大拆大建大开发。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一方面靠房地产开发解决财政支出问题,另一方面靠投资上项目,特别是房地产项目来拉动经济。其结果不仅没有拉动内需,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消费需求和城镇化进程。在未来城镇化建设上,政府应通过体制改革转换自身角色,即从现在的“卖地人”和“投资人”,转变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构建人和执行人,才能走上真正集约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所谓稳定性管理,即通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使城市的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逐步进入一种成熟状态,由此给任何一个愿意居住或进入城市的人带来公平的享受和稳定的预期。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政策制定应具备系统性;其次在政策的实行和操作过程上要有连续性,

不能一届政府一个目标,互不贯通;再次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改革加强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

新型城镇化是城乡一体,且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城镇化。为此,一是要解决好我国高达 2.6 亿的农民工问题,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财政保障体系,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二是要通过新农村建设,提高小城镇和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逐步从空间上和体制机制上消除城乡差别。三是要通过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政策手段,提高农民的富裕程度。只有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才能使其分享现代化成果,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差别。

后工业化时代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将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路径,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注释:

- [1] 高国力:《新型城镇化要有新思路》,《经济日报》2012 年 7 月 23 日。
- [2] 陈怀录、贾睿、唐永伟:《新型城镇化理念下西北地区小城镇规划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13 年第 5 期。
- [3]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 2013 年 06 月 30 日。
- [4] 孙秀艳、王如松:《新型城镇化,生态要优先——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民日报》2013 年 01 月 05 日。
- [5] Northam, Ray M., Urban geography,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1975.
- [6] Friedman, J. A., general theory of polarized developm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2, pp. 82 - 107.
- [7] [英] L·范登堡:《城市发展阶段说》,张延玉摘译自《欧洲城市兴衰研究》,载《国外城市化译文集》,英国牛津珀加蒙出版社,1982 年,第 85 - 90 页。
- [8] Norton Sydney Ginsburg, Bruce KoPpel, T. G McGee,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1.
- [9] 国家统计局:《2013 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年,第 39 页。
- [10] 陈波群、郝寿义:《自然资源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研究》,《自然资源学报》2005 年第 3 期。
- [11] 霍里斯·钱纳里等:《发展的形式:1950 - 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32 页。
- [12] Vance J. E., The Merchant's world: The Geography of wholesal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0.
- [13] 蔡继明、熊柴、高宏:《我国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非协调发展及成因》,《经济学动态》2013 年第 6 期。
- [14] Bruhart, Mathys, Sectoral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a Panel of European Region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8, 2008, pp. 348 - 362.
- [15] 姜瑞斌:《转型时期的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支持》,《农村金融研究》2013 年第 7 期。
- [16] 王可侠、范谷雨等:《产业承接与自主创新》,《江淮论坛》2012 年第 6 期。
- [17] J. Vernon Henderson, V., The Effects of Concent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7503, 2000.

[责任编辑:刘 鏊]